

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书

XIANDAI ZHONGGUO WENXUESHILUN CONGSHU

张新颖 著

20世纪上半期 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修订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新颖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的创新与个案研究上的突出个性，无疑是对当前比较文学领域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疲软状态的一次整体性提高。著作消解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影响研究”的方法，创立出“中国现代意识”这一概念，并整合了其与世界格局下各种现代意识的平等对话的历史，使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不再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接受体或派生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其行文流畅而达意，资料丰富而扎实，论述新颖而不饰，均略而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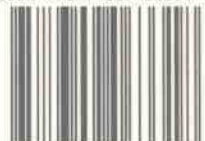
——陈思和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极少数优秀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站在对“全球化”问题的较为透彻的分析立场上，摒弃通常所使用的“冲击—反应”模式，从文学的角度，描绘出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而产生的现代中国的“现代意识”的复杂状况。这样相当深入的描述，是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的不断进展，向前又推进了一步。它的学术价值，也由此得到确立。

这部著作充分显示了作者清晰的思辨能力和敏锐细致的文学分析才能。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学人中，能这样把两方面的才能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见。

——王晓明

ISBN 978-7-309-06331-8



9 787309 063318 >

定价：32.00元

张新颖 著

20世纪上半期
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修订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修订版)/张新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309-06331-8

I. 2…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501 号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修订版)

张新颖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又顺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331 - 8 / I · 458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与原有文化资源的发掘和重造 ——章太炎的极端性思想实验	26
第二章	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 ——王国维寻求“慰藉”的精神简历	44
第三章	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的分裂 ——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	59
第四章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 ——从 20 年代到抗战前夕	81
第五章	都市的感官和现代意识的“病之花” ——20 年代后半期到 30 年代前半期上海 的都市文学	105
第六章	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 ——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	132

第七章 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	
——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	149
第八章 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	
——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	168
第九章 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	
——沈从文的 40 年代	194
附 录 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	213
主要参考书(篇)目	238
人名索引	246
原版后记	261
新版后记	264

导 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 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一

虽然我愿意尽可能朴素地指称我要讨论的重点和中心,但“现代意识”这个词组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纷繁的、包含着诸多差异性的联想和观念,这不仅因为“意识”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对这个难以把握的词进行限定的“现代”,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具有多向度阐释可能性的概念。很显然,“现代意识”不可能是朴素的。可是,我们不能还没有起步就陷在语言的泥淖里挣扎不已,如果没有非凡的能力,那结果恐怕就是徒劳的,更糟糕的是,越挣扎陷得越深,最终没顶了。我这样说好像是一上来就为自己避难就易的企图开脱,其实确是不得不然的。事实上,在实际的讨论展开之前,不可能预先设定和规范讨论对象的复杂性,在达到目标之前,我们也不可能预知我们达到的境地的全部情形,甚至,我们并不能确知

我们最终会走到哪里。

这却并不是说将要展开的讨论是毫无指向性的、完全放任的盲动,“现代意识”尽管歧义丛生,仍然能够划出一个丛生的大致范围;而且,在我个人的论述中,它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这样一来,就基本上可以表明,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追求现代性的心理模式和思想文化表述的质疑、反省和批判,它是时代进程中的不和谐音和无组织的捣乱行为(那些能量足够大的捣乱者的破坏性甚至是致命的,会摇动某种文明的基础),这些令人扫兴的声音和举动,往往来自于从历史大趋势中脱离出来固执地走上岔路和迷途的不合时宜的少数和孤独的个人。可是,在强调对立和反抗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现代意识和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追求是相生相伴的,譬如说,它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发现和揭示进步的异化、反叛和挑战世俗生活进展的信仰的。提及这样的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识的历史意义:它是在动态的展开过程中维持着一种紧张性的历史平衡。这样的事实还提醒我们注意更多的复杂性:“现代或现代派艺术的最为有趣的事是它奇怪地与现代世界交往的方法,接受和溺爱它的许多方面,同时又压制、批评和企图破坏其他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完全无视或抹杀前者、单独以后者为全部特征,显然是有违实际情形的。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所谓的复杂性来掩盖构成意义的主导特征,这也正是我个人的论述中所认同的现代意识以及与此相应的现代文学艺术,“它是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常常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艺术,在思想上不希望为时代或任何既得利益服务,同时,对许多政界人士所拥护的未来的乌托邦一点也不欣赏。艺术可能表明时代的思想,不论是哲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它可能提出或制定时代的某些政治主张。但是它的政治活动基本是文化的政治活动,为了它自

己艰难的目标描绘出它自己艰难的道路。确实,许多现代艺术中最好的作品已经最终作了坚定的选择——反对历史进程为我们决定一切的要求;它们通过历史的重大变形改变了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并让我们接近威·勃·叶芝所谓的‘永恒的技艺’”^①。

不言而喻,上述的观念是基于欧美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情形而建构出来的,但是我要描述和讨论的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对此我需要表明的是,这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含混为中国文学中的西方现代意识。在这两种通常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中,前者探讨的重点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单向的出口——进口的文化和文学贸易关系;而后者,正像它本身已经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探讨的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问题。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两者还往往混为一团,纠缠不清。我这样说并非否认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相反,我自己也正可能要从这里开始,并且还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种研究的成果,来描述和讨论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双边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关注重心的转变内含了基本立场的转变:在未必自觉的西方中心论的作用之下,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往往变成了西方思想、意识乃至文学技巧在中国文学中的投影,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被挤压掉了,因而它自身就被当成了一面扁平的、只具有映照功能的镜子,特别是关于现代意识的探讨,这种倾向尤为突出;而我想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意识。所以,如果不嫌重复,我论述的问题其实可以笨拙地标示为: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中国现代意识。

^①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现代化与现代意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第18—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永恒的技艺”出自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诗《驶向拜占廷》的第三节:“……请求你把我收进/那永恒不朽的技艺。”

我好像为了克服自己不愿意认同的倾向而过分强调了一种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如果会引起这样的误解,那么我就得赶紧说明,我之所以在“现代意识”前冠以“中国”一词,是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而自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所谓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都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内部的问题,而必须在世界格局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此,中国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简单一点说,屡屡出现的“自身”这个词,其实是坚持和凸现中国主体性的存在。拒绝接受外来事物和思想固然可怕,因为这会遏制主体继续生长、变化的可能性;可是在外来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中丧失主体性也同样可怕,因为在外力之中消亡和由于自身活力枯竭而消亡同样是消亡。接受和产生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代意识,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主体;而且我们知道,统称的西方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实也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多种民族和语言的意识主体和文学主体的组合,既没有统一的西方,也没有抹平了差异性的西方现代主义,从地理分布上讲,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彼得堡、芝加哥和纽约、巴黎、伦敦,各有各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①,它们的相通并不遮掩它们的差异,更不取消它们各自的意义。

清末译介西方近代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严复,晚年曾在一封信中评论新知识分子,说:“晚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

^① 可参看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合编的《现代主义》,上编第三部分是关于“现代主义的地理分布”的论述,中译本第一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6 月出版。

无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此辈人数虽众,大都富于消极之道德,乏于积极之勇气……”^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应该能够读出,严复着眼的根本处,不在于从旧学还是新说中选择其一,而是中国近代主体的生成、发展和确立。这一线索贯穿了严复思想的始终,从他早年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甄克思的译介,一直延续到晚年所谓的“背离西方退回传统”(如果充分注意到严复思想一脉相承的线索,就能够看出这一通常的概括显然是表面化的、不确切的^②)。如果没有这样的主体性建设,无论是旧学还是新说,都无助于应对自身的处境并产生真实的意义。

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其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了对近代思想的反省和批判。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先觉者,在倡言现代意识的初始就突出强调了现代主体的位置极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其大致的思路和关注重心,几近如上述严复所言。像章太炎这样的与严复差异甚大的思想家,在对流行的近代新说进行言辞激烈的批判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些新说是否深刻地切入了信奉者的内心和中国的历史现实处境,而他进行批判的依据和资源则力图从本国思想文化之“根源盛大处”求得,以期创造出一个“依自不依他”的中国传统和中国主体。受过严复译介思想强烈影响、同时又是章太炎的学生的青年鲁迅,更

① 《严几道晚年思想(严几道与熊纯如手札)》第 113 页,台北崇文书店 1947 年版。

② 萧公权曾这样概括严复的思想及其变化:“严复深受 19 世纪英国达尔文、斯宾塞尔及赫胥黎诸学者之影响,故其维新言论每以《天演论》为根据。严氏深信人类求存不可不适境自变,而一切改变又当循序渐进,不容骤等。此二者乃其学说之基本,殆始终未尝动摇。方清季闭塞之时,顽固者株守故常,惮于改辙。严氏乃大明变革之义以矫之,其议论遂偏于激进。及民国以后,风气大开,浮嚣之士或欲尽弃旧日文教。严氏持守旧之说以矫之。严氏主张虽先后不同,吾人未可遽断为自相违迕也。”《中国政治思想史》(三)第 754—755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是把他老师的前提置于思想的中心,在他看来,对近代思想引发的“逢迎变化之随波”的批判比对近代思想本身的批判更为紧要,他甚至愤激地表示出这样的意思:就算你那些新说都是正确的,可是因为没有立足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没有从个人最深处出发,不过是唯顺大势而发声,所以是靠不住的;而且正因为那些思想是正确的、新颖的,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所以,这样的随波逐流者应该称为“伪士”,而“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①。由此来理解他的“别求新声于异邦”,应该更能感受到个人和民族主体在他思想中的分量和位置。

立足于现代主体的自觉建构及其顽强坚持,才有可能或偏离或突破一般性的、容易获得普遍认同、乃至形成文化潮流或主干的社会思想观念的种种制约和束缚,产生出具有反思深度的清醒的现代思想和意识。19 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制度自身的衰朽,一方面是外国殖民势力的侵犯,同时暴露出深重的双重危机。作为危机的一种焦虑式反应,一些应对性的新的思想观念逐渐成型了。王晓明有一个很精当的比喻,他说,“在很大程度上,危机感就像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肥沃的一片精神土壤,经过它的反复作用之后,有一些思想种子就这么异常粗壮地生长起来了。”他分析和强调四种观念对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作用:一是注重对抗性的世界/国家观念。这起因于原有的唯我独尊的“天下”观念的破产以及对世界的基本图景和格局的被迫性接受,从而引发出如何理解域外强国和中国的关系问题。19 世纪晚期,虽然有少数对西方了解较多的人(如马相伯、严复)试图纠正对抗性的

^① 《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第 2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一版。对鲁迅这一思想的阐释可参看伊藤虎丸著《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一文,收入作者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思路和想法,但那种中国不变革就要遭受奴役,一旦变革又将可主宰世界的看法却更加普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而严复的《天演论》则在较深的思想层面上起了相同的作用。这种强调现代国家关系中对抗性因素的看法对现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二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规律”的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用各种采自域外的思想材料,迅速构造出一个迥异于传统士大夫信奉的历史循环论的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来,既符合了摆脱危机的普遍愿望,又能够消除人们对现状的悲观看法,它甚至可以支撑那种中国必将迅速富强并称霸的信念。王晓明甚至断言,由《新青年》创刊而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其核心的文化理念即建基于这种笃信“历史规律”的意识。三是一种把社会、国家、民族之类的集体性事物看得至关重要的观念,五四时期到 30 年代对“国民精神”、“国民道德”之类的强烈关注,就是突出的例证。四是在社会、政治变革的意义上特别重视文化、艺术和思想的作用,而忽略其非政治性、非实用价值的观念。“如果说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文化人中间,确实形成了一套以救世为宗旨,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深具乐观意味的思想话语,那么,由于 2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内外环境诸种因素的持续作用,这套话语还逐渐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主干。”^①大致上可以说,我们所要探究和讨论的中国现代意识,正是以此为基本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背景——更准确一点说,中国现代意识正是处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处境中,并且对这样的处境不安、怀疑,进而产生出感受的深度、反思的距离和批判的力量。

^① 王晓明与陈思和的对话《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 年第二期。

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域外新说特别是西学的引进,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热情从事的一项工作。除严复、梁启超等以外,更为年轻的王国维于此用力甚深,有研究者统计他署名和未署名的译篇字数以百万计,广及十三个方面,而以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为大宗^①。尤为突出的是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译介和运用,从他早期一系列个人色彩极浓的哲学、美学论文和文学批评,乃至诗词创作当中,不难发现叔本华和尼采学说的深刻印记,而且他把外来的思想融入了自我个体生命的内部,使之从外在的东西变为感同身受的切己内容。1904 年,二十七岁的王国维撰《红楼梦评论》,立定于叔本华的理论,通过对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全新解释,勾画了一幅由意志、欲望、痛苦、解脱等诸要素环环相生、节节相扣而其中又有绝大之疑问存焉的人生图景。

稍晚一些时候,1907 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发表于次年的《河南》月刊;这一年的《河南》还发表了没有写完的《破恶声论》。这三篇论文和两册《域外小说集》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前鲁迅的现代思想意识。《摩罗诗力说》所述的是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大多可归为浪漫派或“前现实主义者”,可是鲁迅却程度不等地为他们涂上了尼采的色彩,做了接近现代思想意识的变形,而且这篇文章的题记就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偏至论》则直接介绍西方现代文化,论述了斯蒂纳、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其中尼

^① 佛雏《王国维引进西学述略》,为《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的附录之一,载第400—40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采思想对早年鲁迅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一如在更大的范围里,此前此后一段时期内介绍过来的西方哲学家中,尼采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是最大,新文学初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等,也或著文或翻译,宣传和张扬尼采学说,形成思想热点和冲力^①。

除了尼采的个人主义意志崇拜和建立在批判传统文明与市俗主义基础上的超人哲学,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作用的,还有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914 年《东方杂志》介绍了柏格森的学说,随后又有《教育杂志》、《新青年》、《民铎》等刊物推波助澜^②,张东荪译释的《创化论》1919 年 10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 1921 年《民铎》第三卷第一号推出柏格森专号(其中的作者和译者有严几澄、柯一岑、蔡元培、张东荪、李石岑、吕澂、瞿世英、冯友兰、杨正宇、范寿康、梁漱溟、张君勱等),柏格森思想的传播已达高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柏格森学说差不多同时介绍进来,到 20 年代,出现了系统、细致叙述其理论的长文,如朱光潜的《福鲁德的潜意识与心理分析》^③,而且出现了将精神分析运用于文学批评和人物考释的实际尝试,其中有名的例子,如郭沫若 1921 年作《〈西厢

① 田汉译《说尼采的〈悲剧之发生〉》,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1919 年 9 月 15 日;沈雁冰的长文《尼采的学说》,连载于《学生杂志》第七卷第一至四号,1920 年 1 至 4 月;唐俟(鲁迅)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载《新潮》第二卷第五号,1920 年 9 月;郭沫若译《查拉图斯忒拉》第一部和第二部共二十六节内容,分二十六次连载于 1923 年 5 月至 1924 年 2 月的《创造周报》。

② 钱智修译《布格逊学说之批评》,载《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四号,1914 年 9 月 1 日;钱智修《法国大哲学家布格逊传》,载《教育杂志》第八卷第一期,1916 年 1 月 20 日;刘叔雅《柏格森之哲学》,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1918 年 2 月 15 日;柯一岑《柏格森精神能力说》,载《民铎》第三卷第一号,1921 年 12 月 1 日。其他介绍柏格森的文章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民铎》第三卷第一号为柏格森专号,上举柯一岑的文章还由柏格森学说介绍了“意识流”(Conscious Stream)的概念。

③ 朱光潜《福鲁德的潜意识与心理分析》,载《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四号,1921 年 7 月 25 日。

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①，以证文艺创作源于性欲的升华；到 1923 年，他又发表《批评与梦》^②，更以自己的创作来验证精神分析学说。再如潘光旦 1924 年发表的《冯小青考》^③，以弗洛伊德的“自恋”、儿童性欲说对一个中国明末女子作典型的精神分析，堪称绝妙佳例。鲁迅也坦言他的“故事新编”《不周山》，是取弗洛伊德之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④。例证繁多，不胜枚举，事实是从 20 年代一直到 40 年代的文学创作，弗洛伊德的影响不绝如缕，在在可见。这其中有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令人注目，那就是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明权选译连载于《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1 年 1 月 16 日至 22 日），而后又有“未名丛刊”鲁迅的译本和“文学研究会丛书”丰子恺的译本，鲁迅译本至 1935 年已经印到十二版^⑤。这部书的作者创造性地综合了柏格森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文艺的起源作了现代主义观念的解释，强调生命力的冲动和创造，这一思想不仅波及创作，而且渗透进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中，直到 40 年代胡风的文艺理论，仍然可见其活跃的冲击力。

20 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认同和共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还有，作为另一种相反的力量——对吸引、认同、共鸣的抗拒——又将怎样表现出来呢？这样

① 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原收入作者“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革”（《创造十年》）的《西厢》一书，上海新文艺书社 1921 年 9 月版，后《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② 郭沫若《批评与梦》，载《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3 年 5 月。

③ 潘光旦《冯小青考》，载《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十一期，1924 年。后来潘光旦又对此文“重加厘定，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充实成《小青之分析》一书，1927 年 9 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再版时书名改为《冯小青》。

④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341 页。

⑤ 《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列入“未名丛刊”，新潮社 1924 年 12 月第一版，北新书局 1928 年 8 月第五版，1935 年 10 月第十二版；丰子恺译本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1925 年 3 月第一版，1932 年 9 月国难后一版。

复杂的问题当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例略窥一斑,想见彼时的情境和思想、心灵深处的惶惑及其复杂的表现。

民国初年在舆论界影响甚大、同时也应被视为新文学运动先驱人物的黄远生,曾作《想影录》,刊于1916年2月的《东方杂志》,该文主要是摘译日人大住嗑风所著《新思想论》,揭示和宣泄“过渡时代之悲哀”和“现代思想之烦闷”(这是文中的两个小标题)。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前,黄远生已于1915年末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与他有所交往的年轻朋友梁漱溟读了《想影录》,深受刺激,他觉得黄远生带着绝大的困惑苦恼而去,而他本来是有法子帮他解除这绝大的困惑苦恼的:“余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溢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这亟草而成的,就是《究元决疑论》,发表于同年5、6、7月的《东方杂志》。《究元决疑论》针对人“陷大忧恼病苦”、于世间“恐怖犹疑不得安稳而住”的生存境遇而发,也就是说,梁漱溟基本上承认黄远生和西方近现代诸家所揭示的诸多文化和精神症候,他在这篇不算太长的文章里引述西方新说颇多,间采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康德、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思想取为己用,甚至赞叹说“柏格森(Bergson 即《想影录》之别克逊)之所明,尤极可惊可喜。”可是他最终要说的是这些西方新说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所谓‘现代思潮不以宗教伦理为目的’者(远生《想影录》),正此有漏非真之穷露,而不复为人所信。”他认定和开出的药方是佛法,所以十分痛心于“如来大法近在眼前,而不知求(《想影录》所译《新思想论》无一语及佛)”的社会趋势^①。

^① 梁漱溟《究元决疑论》,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1—2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